

论邓小平关于大局即政治的思想

叶娟丽

作者 叶娟丽, 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生; 武汉, 430072

关键词 邓小平 政治 大局

提要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建设是大局, 而大局即是政治, 这是邓小平政治思想的重要观点。在他看来, 大局不是指一般的经济利益关系, 而是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国家利益等各种利益关系相互作用的综合表现。这种以大局来界定政治的思想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在新时期的具体体现。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 政治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的利益决定的, 在阶级社会, 这种利益主要地体现为阶级利益。而在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建设最能体现人民大众的利益, 因而也就是最大的政治。

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邓小平关于大局即政治的思想就像他关于社会主义的其它理论思考一样, 蕴含在解决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问题当中。他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和他独特的理论风格, 使得他思考和回答问题的思路与众不同。他始终认为, 处理问题要着眼于长远, 着眼于大局, “小局必须服从大局”^①, 大局即是政治。为了大局, 牺牲一些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是值得的, 也是必要的。在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建设是大局, 从而也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任何否认这个大局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与历史唯物主义背道而驰的。

一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我们的大局是什么, 一直是困扰我党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我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当时, 在全国范围内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被消灭的情况下, 我党在实践中没有及时地将工作重心转移, 各种政治运动不时地冲击着经济建设, 直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 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致使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国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以邓小平为首的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批判了极左错误, 确立了“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思想路线, 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 对于“什么是大局”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心目中开始明朗起来。

1. 经济建设是我们当前的大局

邓小平最先提到大局问题, 是在 1975 年。当时, 他对大局的提法比较笼统。他说, “现在有一个大局, 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②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我们的大局, 是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 是他对我党历史上的失误痛定思痛的结果。尽管当时文革还没有正式结束, 文革的余毒还没有肃清, 但邓小平凭着他独特的思维敏锐性, 已经预见到了新时代的到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党正式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 邓小平更加明确地强调四个现代化、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他多次强调, 四个现代化, 经济建设是我们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是我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 从而也就是我们当前的大局。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 邓小平关于经济建设是大局的思想具体体现在他治党、治军和治政的实践中。在 1984 年 11 月 1 日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他提到“想谈一谈顾全大局的问题。这个大局就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大局。”^③在这里, 他再次提到经济建设的大局, 并把它同军队的建设结合起来。认为, “现在需要的是全党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 照顾这个大局。……总之, 大家都要从大局出发, 照顾大局, 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发展起来就好办了。大局好起来了, 国力大大增强了, 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 更新一些装备, ……

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要教育我们各级干部,关心国家大局,就是使我们国家在二十年内发展起来,……我们军队要一切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④短短的一段话,邓小平就用了7个大局,可见他充分肯定发展经济在我们党和国家建设中的中心地位。正是从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来认识问题,邓小平才提出经济建设是大局,并进而提出经济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的命题。

2. 经济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

正是因为经济建设是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局,邓小平既而提出,经济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为了给即将到来的思想解放运动造舆论,邓小平继续鼓励全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首次从政治的高度评价经济建设的伟大意义,提出了经济建设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的思想。在1978年的一次讲话中,他指出,经济建设“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⑤之所以经济建设是我们最大的政治,原因在于经济建设符合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在这里,邓小平首次将判定政治的利益标准提了出来。正是以利益为评判标准,邓小平将经济建设提到了政治的高度,将经济工作赋予了政治的内涵。

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不仅因为它符合人民最根本的利益,而且它还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正如邓小平所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目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政治工作是要做的,而且是要好好地做。但是,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⑥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不是就眼前而言的,它是着眼于人民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但它与为人民谋取眼前的利益并不矛盾。但无论是为人民谋取眼前的福利,还是为人民的长远着想;是解决目前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还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我们都必须坚持经济建设这个最大的政治。所以邓小平反复告诫我们,“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⑦对于这个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他又将其表述为总任务,或总路线。他说,“这样表述我们的这个总任务,或者叫总路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表述了我们现在的总路线。这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总路线还不是最大的政治?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⑧邓小平将经济建设提高到总路线的高度,将经济建设看作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说明我们工作的着力点是否放在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面,这绝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而首先是个政治问题。

3. 邓小平主张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是从经济建设是大局的角度而言的

经济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但经济建设本身作为社会的经济生活和具体的生产活动,并不就是政治。因此,不是任何经济活动都能构成最大的政治。只有当经济建设在整

个民族、社会、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中已经上升为全局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当经济建设成为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全局的时候,经济建设才成为最大的政治。邓小平主张经济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正是从经济建设是大局的角度而言的。邓小平也曾多次提到,“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⑨。的确,解放思想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而且与经济建设这个最大的政治密切相关。但是,这个问题涉及的不是当时社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矛盾,解决的不是当时最带根本性和最具全局性的问题。所以,它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但不是当时我们最大的政治。另外,邓小平也提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⑩同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是关乎经济建设的大问题,邓小平甚至将其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但这个问题毕竟不是能够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带有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问题,它的较好解决有助于经济建设这个最大的政治的发展,但它不是我们最大的政治。还有一些问题,邓小平也认为是很重要的政治问题。如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和修改意见中,邓小平一再提到,“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⑪

从邓小平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并不忌讳谈政治二字,事实上,他多处使用这个词,但是使用的界限十分明确。在他看来,政治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态,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在每一个具体的层次上使用政治二字,其含义是大不一样的。政治不不只是指经济建设,但在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经济建设能解决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最根本矛盾,只有经济建设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所以,只有经济建设是我们目前最大的政治。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正是基于经济建设是我们当前的大局这一角度而言的。

二

从政治的高度来看待经济建设不是从邓小平开始的。列宁早在1920年就把经济建设任务称作“经济建设方面的政治”,他认为如果不从政治上来看待问题,就不可能从政治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经济建设是大局,是针对经济建设的政治意义而言的。在这里,大局并不仅仅涉及简单的经济利益,经济建设也并不是指追求一时一地的经济成果。利益有不同的载体和层次,在邓小平的理论中,大局不是简单的经济利益,它是指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国家社会利益的综合体现。

1. 经济建设所涉及的全局利益首先是一种长远利益,而不是眼前利益

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凡事高瞻远瞩,着眼于长远。他强调经济建设在当前的高度政治意义,不仅仅是为了眼前的一时一地的繁荣幸福,而是着眼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如他重视对外开放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不斤斤计较于

眼前的得失,而坚持其长远利益。他说,“要允许吃亏,不怕吃亏,只要对长远有益就可以干。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⑧敢吃眼前亏,一切只为长远利益,这正是邓小平对外开放政策的出发点。经济建设对我们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意义,正在于它能够中华民族的永久繁荣富强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能为社会主义制度继续焕发和保持强大生命力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长远的打算,邓小平提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四化建设。”^⑨为了赢得经济建设的时机和条件,我们需要长治久安的国际国内环境;同时,为了国家和民族永远的繁荣稳定,我们更需要坚持经济建设这个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

2. 这种全局利益是一种整体利益而不是局部利益

经济建设符合全局利益,这种全局利益,是整个民族、社会、国家甚至世界上所有正义民族的利益而非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在战争年代,为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这一全局利益,很多个人都为之作出了牺牲。那么,在今天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经济建设这一大局,任何个人的暂时利益也应该可以牺牲。正如邓小平所言,“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渡过困难。”^⑩在当前的经济建设大局下,我们也应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在改革所进行的利益大调整和重组中,牺牲小我,一切以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我们对内寻求发展,同时,也以世界整体的和平与发展为根本目标,不以牺牲他国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⑪

可见,邓小平所强调的经济建设是大局,是最大的政治,不是从一般的意义上而言的。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时代背景下,在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经济建设不仅在提高我国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也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经济建设不仅符合我们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以及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也符合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建设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全世界面临的最大的政治。

3. 这种全局利益是一种根本利益而不是指的一般的经济或文化等具体利益

经济建设之所以是大局,是最大的政治,还在于经济建设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一般的经济文化利益。经济建设要解决的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最主要矛盾,而不是一般性的次要矛盾。“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

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⑫经济建设正是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⑬也就是说,各项工作都要有利于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正是从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角度,邓小平主张,经济建设是大局,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

总之,我们是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否承认经济建设是我们当前的大局这绝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而首先是个政治问题。因为在革命胜利以后,经济建设就成为我们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成为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正是在这样一个高度上,邓小平认为,经济建设是中国当前的大局,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政治。

三

尽管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但却不能把二者相等同。所谓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是从经济建设是大局这个角度而言的,或者说,是从经济建设的全局意义和政治意义方面而言的。以利益来判定大局、以大局来观察政治,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在新时期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从其根源上讲,政治是经济的产物,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其政治生活的内容、范围和性质,正如列宁所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⑭;就其内容来讲,政治涉及社会根本的全局的利益,是对社会全局利益的调控;就其层次来讲,政治生活是人类生活中社会属性和生活价值的最集中表现,政治利益是人类生存利益的最高代表。由于政治受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政治也必然与特定的经济发展形态相适应,而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和本质。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就已提到,人类社会一切政治形态都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这两种方式的基础有根本的区别。按时间顺序说,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义为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义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的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政治社会是按地域组织起来的,它通过地域关系来处理财产和处理个人的问题。在这里,摩尔根为我们描述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治生活形态。前者是原始社会的政治生活,后者是阶级社会的政治生活。前者是非阶级的政治生活,后者是阶级的政治生活。可见,人类的政治生活是可以加以区分的,即有阶级政治和非阶级政治之分。正是通过对大量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著作和现实政治生活的深刻分析,马克思完成了他的第一个伟大发明,即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法,并借此分析了政治的内涵,揭示了阶级社会政治的本质就是阶级的利益关系,即阶级关系。

阶级分析方法是分析政治的一种重要的方法,但这只是就阶级社会而言的。在非阶级社会,阶级尚未出现或已经消

亡,阶级不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最本质现象,因而阶级分析方法也就不能适用。此外,阶级利益与阶级的政治利益也是不一样的,不是所有的阶级利益都构成阶级的政治利益,只有当阶级的利益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扩展到全局的范围,一定的阶级利益才成为阶级的政治利益。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处理现实中的政治关系,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阶级之间的斗争可能是经济利益之争,可能是文化利益之争,也可能是政治利益之争。只有当阶级之争涉及全局,涉及整体,涉及政治领域时,这样的阶级斗争才是政治斗争。至于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提到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①这一结论,我们应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由于人类学的不发达,当时人们对史前无阶级社会的了解很有限,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和文章中所理解的人类社会事实上就是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中,人们进行斗争的目标都是为了国家机器这个专政工具,所以,阶级社会人们所进行的任何阶级斗争都上升到了国家政权的高度,都属于政治斗争的范畴。此外,当时正处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纲领,《共产党宣言》较多地强调政治斗争和夺取政权的作用,既是应该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任何阶级斗争都能构成政治斗争。过去,我们对这一点没有清醒的认识,在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很多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纲上线为阶级之间的斗争,上升为阶级斗争;同时,将小范围内的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方面的分歧任意地上升到全局的高度,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从而抛弃掉经济建设这个工作中心,把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引入到一场并不存在的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中,既延误了现代化建设的时机,也极大地伤害了广大人民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在扼杀意见分歧的同时,也扼杀了我们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民主生活传统。

可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我们对政治的内涵的认识也经历了一次变革。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的内涵和外延都有着根本的变化。一方面,由于旧的资产阶级法权和国际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我们还需要国家这个专政工具,还需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政治不能不带上新社会政治的特征,即政治总是与一定阶级的利益相联系。在我国,政治具体体现为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劳动者阶级与反对或企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阶级之间利益的相互关系,政治斗争也就体现为这两大阶级之间在涉及全局问题上的斗争。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在我国国内已经消灭,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再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需要做的不再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来解放生产力,而是如何利用国家机器来发展生产力,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在这一阶段,国家发展到它的最后阶段,它不再是完全的镇压机器,而主要的是生产机器。政治既不是完全的阶级政治,也远未发展到非阶级政治,我们正处于阶

级政治与非阶级政治交叉并存的时期,我们的政治概念也由以前所理解的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的狭义政治演变成为今天包括经济建设在内的广义政治。列宁曾说过,“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②这里,两个政治的内涵显然是不同的。前者指的是包括经济建设在内的广义的政治意义,后者指的是过去所理解的以阶级斗争为主角的狭义政治。对这两种含义不同的政治概念,列宁用得比较多。1918年3月列宁在论述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时指出:“现在(在文明民族的现代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所说的管理,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具有主要的意义。通常,人们正是首先把主要是甚至纯粹是政治的活动同‘管理’一词联系在一起。然而,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原则和实质,以及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实质是政治任务对经济任务来说居于从属地位。”^③毛泽东在1958年1月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也提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的基本内涵已经不是单纯的阶级斗争,而主要是指人民内部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对政治的认识也应有新视角。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错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不仅仅是阶级斗争,而且包括经济建设;不仅如此,经济建设本身就是政治——且是“主要的政治”,因为它是“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是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④社会主义时期的最大政治就是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是大局,因为只有经济建设这一最大的政治,才能为我们一劳永逸地消灭所有阶级,为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邓小平从大局来定政治的思维方式所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为我们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的本质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前提。

注 释:

①③④ ⑫⑬⑰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 98 99—100 313 57 23页。

②⑤⑥⑦⑧⑨ ⑩⑪⑭⑮⑯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 150 194 234 248—249 141 143 299 233 241 182页。

⑱⑳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7 362页。

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

㉒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22页。

㉓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9页。

(责任编辑 吴友法)